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优秀文学作品精选

中篇小说卷
(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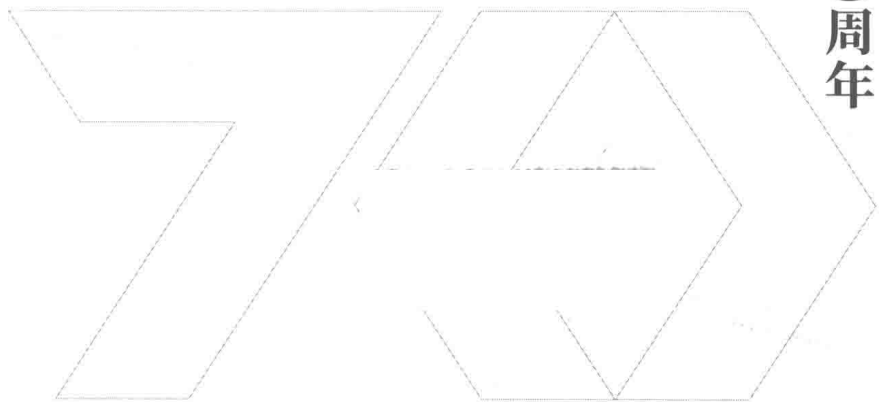
主编 洪治纲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
优秀文学作品精选

中篇小说卷
(上)

主编 洪治纲



北京出版集团公司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洪治纲，文学评论家、学者。1965年10月出生于安徽省东至县。文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院长、教授。浙江省“钱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与批评，曾在《中国社会科学》《文学评论》《文艺研究》等刊物发表论文及评论三百余万字。出版有《守望先锋》《中国新时期作家代际差别研究》《无边的迁徙》《中国六十年代出生作家群研究》《主体性的弥散》《心灵的见证》《邀约与重构》等个人专著十余部，以及《国学大师经典文存》《最新争议小说选》《年度中国短篇小说选》等个人编著三十余部。曾获第四届全国鲁迅文学奖、首届全国“冯牧文学奖·青年批评家奖”、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二等奖、浙江省和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首届“当代中国文学评论家奖”等多种文学奖项。

出版说明

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指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精神。任何一个时代的经典文艺作品，都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和精神的写照，都具有那个时代的烙印和特征。”为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展现我国70年来文学事业的光辉成就，回顾我国当代文学发展的历史道路，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特编辑出版《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文学作品精选》。检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以来的经典文学作品，汇集成卷，既是为中国当代文学的70年立一历史存照，也便于我们的文学工作者和广大读者从中萃取精华、汲取能量，不忘本来、继往开来，使文学成为新时代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力量。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优秀文学作品精选》按文学体裁分为8种12卷，各分卷主编为“中篇小说卷”洪治纲，“短篇小说卷”贺绍俊，“报告文学卷”李朝全，“散文卷”王必胜，“诗歌卷”李少君、张德明，“儿童文学卷”李东华，“戏剧卷”傅谨，“文学评论卷”白桦。编选工作坚持“二为”方向，贯彻“双百”方针，从当代文学发展的实际出发，兼顾不同题材、不同创作风格、不同地区（包括港澳台）

和不同作家的作品，力求全面准确地反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以来文学发展的风貌。

本次编辑工作，我们秉承尊重作品原貌的原则，对于旧版中明显的讹误之处均予以更正，以弥补缺憾；但各部作品因创作年代、作者风格、地域特点等不同，在相关词语用法、儿化音表达方面也存在一定差异，本次编辑处理未作统一，力求最大程度上保持作品的本来面貌。相较于中国当代文学70年来的厚重博大、成就斐然，本套丛书的编辑出版囿于规模及篇目有限，尽管各卷主编在遴选过程中编选的作品均是经过时代淬炼与读者检验的文学佳作，但也难免有遗珠之憾。在编辑出版过程中，我们得到了作者、作者亲属及有关专家学者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此一并谨致谢意。因部分作品年代久远，我们未能取得相关作者及版权继承人的联系方式及授权，提前收录作品尚希见宥。本书出版后，我们将继续开展联系工作。如作者及版权继承人得知信息，也请及时与我们联系。再次致意。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2019年8月1日

时代、伦理与人性的纠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篇小说观察

洪治纲

—

无论从哪方面来看，中篇小说都是一个比较尴尬的文体。一方面，它在文学理论和批评实践中，始终没有获得独立而清晰的文体地位，不像长篇小说和短篇小说那样，拥有十分丰富的理论建构和审美形态的定位；另一方面，它在中国现当代文学特别是新时期以来的文学中，又呈现出强劲的发展势头，并在许多重要的文学思潮中占据重要地位，一直拥有极为广泛的接受群体。面对这种尴尬的局面，我们固然可以列出诸多原因，譬如西方文学中就没有中篇小说的概念，中篇小说是中国大型文学期刊催生的特殊文体，中国文艺理论家对中篇小说的自律性特质缺乏建构热情等等，但结果仍是老方一帖，没人能够说清楚什么是中篇小说。

我们唯一能做的，似乎只能从篇幅上对它进行一个大致的划分，即介于长篇与短篇之间。如果参照全国鲁迅文学奖的作品征集公告，中篇小说就是指版面字数在2.5万至13万字之间的小说。仅仅依据篇幅来划分一种文体，当然会存在某些不足，但是“存在即合理”，多年来大家

也都一直默认了这种划分原则。因此，在面对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卷帙浩繁的中篇小说，我们也只能大体上参照这一原则进行遴选。当然，在具体的操作过程中，我们也会努力渗透自己对于中篇小说在文体层面上的理解和思考。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第一部中篇小说，应该是《人民文学》在1949年10月创刊号上推出的刘白羽的《火光在前》。这是一部正面书写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人民解放军渡江作战的作品，充满了大无畏的革命豪情和统一中国的雄心壮志。随后，马加的《开不败的花朵》、孙犁的《铁木前传》、杨尚武的《戈壁滩上的风云》、白桦的《山间铃响马帮来》、陈登科的《活人塘》、白朗的《为了幸福的明天》、杜鹏程的《在和平的日子里》、康濯的《水滴石穿》、柳青的《狠透铁》、方纪的《来访者》等中篇不断涌现，并获得不同程度的反响。纵观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前十七年”中篇小说创作，无论数量还是质量，都不算非常突出。具体地说，题材相对集中，绝大多数立足于战争记忆、社会主义建设和边疆生活的特殊风情；主题相对单一，主要是通过正与反的张力结构，传达作家对时代意志的赞许；叙事比较传统，基本上遵循现实主义手法；文体意识并不突出，很少有作品能够从容地展示中篇特有的叙事容量，线索、结构和人物关系处理，均处于短篇增殖的维度上。只有《铁木前传》《来访者》《水滴石穿》等作品要稍显成熟，体现了作家对日常生活内部伦理的特殊洞察与思考。

正是受制于这一客观的创作现状，我们选择了孙犁的《铁木前传》和方纪的《来访者》作为这一时段的代表性中篇。其中，《铁木前传》虽然没有脱离时代的特殊印痕，但它始终立足于乡村农民的日常生活，巧妙地呈现了身份变化与情义伦理之间的内在博弈。木匠黎老东与铁匠傅老刚因为手艺人合作关系，渐渐变成亲密无间的朋友，甚至彼此认

了亲家。然而，随着解放后生活的变化，精明的黎老东开始富有了，而老实的傅老刚依然一贫如洗。于是，围绕着制作大马车的过程，傅老刚终于感受到了黎老东的傲慢心态，包括黎老东对九儿和六儿亲事的回避。傅老刚果断浇灭了炉火，搬离了黎家。财富身份的变化，最终摧毁了两家之间珍贵的情义伦理。这部小说的独到之处在于，孙犁对黎老东的傲慢与傅老刚的自尊在分寸感上把握极准，精妙地呈现了情义与身份之间的博弈过程，以及这种博弈对两家后代的人生影响，显示了作家内在的艺术腕力。

方纪的《来访者》则动用了双重视角，叙述了一位小知识分子与民间女艺人之间的情感故事。其中，以康敏夫的视角所呈现出来的叙事，饱含了年轻人对爱情的狂热追求与病态般的痴迷，也折射了小知识分子渴望扮演拯救者的理想冲动。然而，当他与女艺人真正建立家庭之后，作为传统男人骨子里的自尊与自私，便与他的敏感多疑聚合在一起，逐渐消解了自己当初作为启蒙者和拯救者的价值承诺，导致女艺人断然出走，康敏夫由此走向颓废与自虐。细细品味康敏夫的角色，我们既可以看到鲁迅笔下涓生的影子，也可以发现郁达夫笔下于质夫的形象，隐含了启蒙、被启蒙甚至是反启蒙的复杂意绪。而在“我”的视角之下，叙事则充满了时代特有的观念性话语，人性的复杂、微妙和温暖，虽也不时地击中了“我”，但最终“我”还是被历史意志所左右，失去了应有的人情伦理。而这，同样也有其耐人寻味之处。

“文革”期间，中国当代文学发展处于低潮，中篇小说也不例外。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中篇主要有：李心田的《闪闪的红星》，浩然的《西沙儿女》，辛刚的《海防线上》，李学诗的《矿山风云》，张长弓的《青春》，杨啸的《红雨》，以及刘心武的《睁大你的眼睛》等。因为历史的局限性，这些作品过于强调时代观念，无论审美内涵还是叙事

策略，都相对单一，尚缺乏能够反复阅读的经典意味。

二

进入新时期之后，中篇小说创作迎来了发展高峰。从最初的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到先锋文学、新历史小说、新写实小说，在上世纪80年代的各种文学思潮中，中篇小说几乎都成为一种标志性的存在。我们甚至可以说，正是大量优秀中篇小说的涌现，才有效展示了这些文学思潮的基本属性与审美特质。与此同时，通过各种文学思潮的相互激荡，中篇小说在文体发展上也迎来了自身的黄金时期，并涌现了一批具有经典意味的作品。因此，这一时期成为我们重点关注的历史时段。立足于中篇小说在文体上的有效拓展，并着眼于审美内涵的丰富性，以及创作主体的思考向度，我们在反复的比较和权衡中，选出了一些自己比较满意的中篇，以期为这段辉煌的历史进行简要的注释。

在审美内涵的开拓上，我们选择了在不同层面进行深度探索的优秀之作。如对现实生活问题的深度思考上，有张洁的《方舟》、路遥的《人生》、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朱苏进的《射天狼》、王朔的《顽主》、方方的《风景》等。这些中篇都直面各种复杂的现实境况，于人生的困境中展示了人们生存的精神面貌和理想欲求，也对人性及命运进行了别有意味的思索。像张洁的《方舟》，就是一部质询性别文化的锋利之作。它在启蒙主义的文化视域中，从两性情感与婚姻的角度，为当代女性的独立与自由发出了强烈的生命吁求。无论是荆华、柳泉还是梁倩，作为现实社会中的白领精英，她们在两性情感或家庭婚姻中，却总是受到这样或那样的屈辱性遭遇，这也使她们深刻地意识到，男权

背后所固有的文化沉疴，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地规训着女性生命的自由成长。

路遥的《人生》是一曲城乡对立中的生命悲歌。它以三角恋为故事主线，通过高加林在刘巧珍与黄亚萍之间的情感游弋，表达了“爱欲与文明”的潜在同构。小说中的黄亚萍代表了一种充满异质性的城市生活、城市情调和城市镜像，而刘巧珍则是稳固、贫穷、质朴而熟悉的乡村生活代表。高加林在爱欲的获取中，几乎是必然性地选择了城市文明的符号化对象。这既是为了反抗命运，也是源于人性的自然追求，但它与强大的传统伦理却构成了尖锐的对抗，也使高加林注定要成为生活的失败者。

刘索拉的《你别无选择》是一部将时代观念、青年亚文化、艺术创新与个体解放融为一体的优秀之作。小说以一种充满玩世般的轻松语调，呈现了李鸣、孟野、森森等一群作曲专业的大学生散漫而无序的校园生活。他们是那个时代的天之骄子，对创新与实验充满激情，然而他们却不得不以各种消极方式，与平庸的教学模式抗争，与陈旧的审美观念进行博弈，以呼应变革时代的艺术诉求。

朱苏进的《射天狼》以一种充满激情的语调，成功地塑造了袁翰等中国当代军人的铁血形象。在和平时年代，军营也宛如一个小社会，各色人物、各种利益、各种关系也同样交织在一起，形成了一种特殊的权力场所。但军人的天职与梦想、家国情怀与英雄情结，依然主宰着真正军人的灵魂。由是，当家庭的困境、妻儿的无助和军人的天职出现巨大的冲突时，袁翰最终还是以硬汉的姿态，战胜了世俗伦理的纠缠。

方方的《风景》作为“新写实”小说的扛鼎之作，充分发挥了中篇小说在文体上的特殊优势，以死亡视角和全知视角的交叉叙述，呈现了一个底层家庭缭乱、粗粝、暴烈、无望的日常生活。在那里，所有的

血缘亲情被粗野的人性践踏，所有的世俗伦理被本能式的生存所剥夺，生命的野蛮生长成为人生最无奈的风景。失序时代的种子，最终成长为社会边缘地带的野草，虽然找不到生命应有的尊严，却透射出强劲的生命力。

王朔的《顽主》是一部充了解构意味的优秀之作。小说围绕着“替人解难、替人解闷、替人受过”的“三T”公司所展开的各种业务，通过于观、杨重、马青等青年人的四处奔波和玩世般的生存体验，撕开了日常生活中各色人等的生存困惑或尴尬处境。在那里，他们替作家宝康策划并举办颁奖晚会，替不能按时赴约的人去赴约，替不能满足妻子要求的丈夫陪其夫人聊天、代其挨骂……他们乐此不疲，是因为他们洞悉了生活中不为人知的人性；他们玩世不恭，是因为他们清楚自己只是生活的润滑剂；他们简单率性，是因为他们看透了太多的虚伪与做作；他们乐于以低俗的方式随波逐流，是因为“端庄与高雅”常常显得不堪一击。所以，他们以自己特有的生存方式，将那些看似庄严的生活伦理击打得体无完肤。

在传统历史文化的现代反思中，陆文夫的《美食家》、阿城的《棋王》、冯骥才的《三寸金莲》、铁凝的《棉花垛》、苏童的《妻妾成群》等作品，无疑都是精粹之作。这些作品要么从现代角度，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别有意味的审视；要么从平民立场，对宏大历史进行了鲜活多样的重构。像陆文夫的《美食家》，就是从传统饮食文化出发，通过朱自治的纯粹、执着与通达，展示了中国传统饮食的内在魅力。它既有寻根文学的流韵，又传达了“民以食为天”的人本思考。朱自治的“过分”或纯粹，就在于他不识时务，不积极地投身于集体主义的利他行动，甚至不遵从劳动者的基本伦理，一生所忙就是凭借祖上留下的大量房产，四处寻吃觅喝，让自己的每天生活吃得称心如意。虽也逃不脱

各种挫折，但最终还是由一个浑浑噩噩的吃客变成了社会名流“美食家”，其中既体现了时代的人本变迁，也展示了传统饮食特有的文化魅力。

阿城的《棋王》是一部有关中国传统文化的反思之作。小说中的王一生在精神与肉体的双重饥饿中成长，只能借助下棋来抵抗生活的双重匮乏，并由此领悟到棋道中的儒、道、释之文化精髓，最终演绎了一场空前绝后的“车轮大战”，成为一代棋王。这部小说的特殊魅力在于，它将中国传统文化抽象成具有特殊意味的哲学，并以互渗互补的方式，转化为有关棋品和棋艺的寓言。

冯骥才的《三寸金莲》演绎了一段传统畸形文化在近代社会中的崩落过程。戈香莲通过艰辛曲折的缠足，终于使自己在佟忍安的家族里成为传奇。这种传奇，当然是以满足男权文化的陋习为前提，以女性生命的玩具化为代价。戈香莲无法认识到这种悲剧性的生命境遇，相反，她开始依仗自己的“成功”人生，规训后辈继续重演自我的人生轨迹，结果在时代的变迁中彻底破产，以至于在“缠足与天足”的对抗中，被出走多年的女儿牛俊英当场羞辱。它让人想到张爱玲的《金锁记》，使人们看到，某些反人性的传统伦理，总是以奇特的方式获得了自我承传的特殊能力。

铁凝的《棉花垛》是一部别具韵味的农事诗。它从乡村伦理中特有的宽容性出发，让世俗的人性欲望与贫瘠的物质生活交织在一起，演绎了一曲愉悦而又芳香的生命之歌。小说中的米子，用自己的坦率与妖娆，让贫乏枯燥的百舍村活出一些生命的诗意。或者说，米子和小臭子这一对母女的生活，不仅照亮了乡村，也使我们看到传统伦理与人性之间的进退自如。

苏童的《妻妾成群》立足于日常生活中的历史情境，借助重构性

的写实手法，鲜活地呈现了一个封建家族中妻妾之间的权力博弈。小说中那位虚弱不堪的家长陈佐千已不重要，重要的是，在陈佐千的权力意志调控下，四太太颂莲、二太太卓云和三太太梅珊之间，在传统伦理的遮蔽之下，不断上演各种或明或暗的生存之争。这种争斗，从地位、尊严，到权力、命运，步步为营，甚至关乎生命。它既体现了传统家族伦理巨大的吞噬能力，连受过新式教育的颂莲也无法挣脱，又揭示了人性深处的晦暗与疯癫。

在人性面貌的探索中，不少中篇都借助特殊的历史境遇，展示人性扭曲乃至畸变的状态，折射了当代作家对“文学即人学”的深度思考。其代表性的作品有张贤亮的《绿化树》、王安忆的《小城之恋》、余华的《一九八六年》等。像张贤亮的《绿化树》，就从反思角度，揭示了特殊年代里知识分子从肉体到精神的多重扭曲。这些扭曲，以饥饿与荒芜为表征，使章永璘的自我拯救陷入无边的迷津。只有当马缨花出现之后，章永璘的生命从食物、肉体到精神，才开始出现苏醒的迹象，也使他在爱与理想之间有了更丰沛的生命体验。小说中的马缨花作为一个拯救者的形象，撕开了时代、人性与知识分子理想的各种错位及荒谬，并成为章永璘这一代人渴慕的生命安慰剂。这部中篇，与作家的《男人的一半是女人》等一系列作品，共同构建了一个有关生命拯救的寓言。

王安忆的《小城之恋》是一曲有关荒凉岁月里人性扭曲的生命挽歌。在剧团里一起成长的一对青年男女，因为练功失败而导致身体变形，又因为身体变形而导致理想的破灭，最终从舞台中心滑向幕后的角落，并由身体和理想的扭曲，转向两性之间的纵欲。这种纵欲，看似折射了特定时代的荒凉人性，实则体现了扭曲者的绝望式反抗——以短暂的、扭曲的狂欢，对抗无望的未来，体现了作家对理想与命运的双重

审视。

余华的《一九八六年》采用了“倒影式”的叙述策略，站在“文革”结束十年之后的时间维度上，不断推演曾经遭遇的一些历史记忆。迫害致疯的历史老师无意中重返小镇，成了人们每天取乐的对象。没有人知道他是何人，也没有人知道他来自何处，疯子用曾经谙熟的中国历史上的各种酷刑不断进行自戕，最终获得的只是看客们的快乐。在这里，历史与现实、苦难和遗忘、看与被看被作家巧妙地拼接在一起，并通过令人惊异的血腥细节，一幕幕地呈现出来，体现了小说内在的巨大张力。

在叙事形式的自觉实验中，这一时期涌现了大量备受热议的中篇，也有不少值得不断阐释的丰沛之作。为此，我们选择了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史铁生的《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和格非的《迷舟》。其中，马原的《冈底斯的诱惑》是一部在叙事形式上有着革命性意义的中篇。它以“元小说”的叙述方式，在犬牙交错中讲述了三个故事：陆高和姚亮去看“天葬”的故事，藏族猎手穷布发现喜马拉雅山雪人的故事，顿珠和顿月两兄弟的故事。这些故事要么虎头蛇尾，要么不断节外生枝，要么逻辑线索含混不清，甚至缺乏必要的可信度，但它们都以各自特有的方式，呈现了西藏高原的神秘、广袤、纯洁与传奇，也展示了作家在讲述故事过程中的现代技艺。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它体现了内容与形式的双重“诱惑”。

史铁生的《一个谜语的几种简单的猜法》同样是一部在叙事形式上具有变革意味的中篇。它以寓言式的叙事策略，将人生喻为一种谜局：一、谜面一出，谜底即现；二、已猜不破，无人可为其破；三、一俟猜破，必恍然知其未破。在这种充满禅机的隐喻之中，作家演绎了四个小故事：“我”与奶奶关于谜语的对话；“我”与她（妻子）的电话交

流；病中的“我”、1床、3床三位患者与她（医生）面对生死的态度；“我”、骑车男围绕一对少年之爱的自省与思虑。这四个故事，从不同角度折射了人生与命运的不确定性和多变性，人生问题不可能存在所谓正确的、唯一的答案，人生就像猜谜，谜底永远是不确定的，它取决于不同个体对自己命运的理解和把握。

格非的《迷舟》在一种宿命式的叙事氛围中，讲述了一个命运失控的故事。萧旅长从跨过那条为父奔丧的河流之时，命运便变得不可把控。在自己的部队中，他掌控数千人的生命，然而，当他一旦离开自己的部队，连自己的生命也变得游移不定。在他踏上故土的过程中，一连串的偶遇和巧合，注定了他不可能握住自己的命运。所以，萧旅长的死，与其说是一种身份的错位，还不如说是命运的荒诞。在这里，时代与伦理退到了幕后，小说所呈现的，是格非在先锋文学时期对非理性人生境遇的特殊迷恋。

三

当历史进入上世纪90年代之后，面对中国社会的市场化转型，曾一度涌现了大量有关社会问题的“新现实主义冲击波”小说，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也都是一些中篇小说，包括谈歌的《大厂》和《车间》、何申的《信访办主任》、刘醒龙的《分享艰难》等等。紧随其后，又出现了“个人化写作”思潮，同样涌现了一大批专注于女性个体生命体验性书写的中篇小说，如陈染的《与往事干杯》和《无处告别》、林白《致命的飞翔》和《瓶中之水》等。这些中篇当然也别具特色，但总体来看，还缺乏反复品味的内蕴。更重要的是，从这一时期开始，长篇小说发展极为迅猛，并在小说创作领域逐渐占据了统领地位。因此，上

世纪90年代之后的中篇小说发展，步入一个相对平稳的历史阶段。一些实力派作家经过中篇小说的历练之后，纷纷从事长篇的写作。所以，在这一阶段的中篇小说遴选，我们更看重那些在精神内涵上具有开拓性的优秀作品。

王小波的《黄金时代》无疑是一部才华横溢的黑色幽默之作。“下放知青”王二和陈清扬，并未对物质困顿的现实表示不满，却对精神的匮乏耿耿于怀。面对貌似强悍森严的精神禁锢，他们虽然不断地寻找反抗之路，但每每陷入更大的命运陷阱。于是，他们将绝望伪装成玩世不恭，将解构作为反抗的手段，果断高举着自由和欲望的大旗，在一次次痛快淋漓的生命宣泄中，彻底击溃了时代伦理的虚弱与诡异。饶有意味的是，王二和陈清扬的“敦伦”“友谊”，既是青春和人性的妙曼之舞，又是虚无与绝望的抗争方式。

毕飞宇的《玉米》巧妙地探入时代的权力末梢，让一位少女为了内心的体面和家庭尊严，在强大的世俗伦理中勇敢地抗争。当玉米还是小大人的时候，她就深知家庭尊严的重要，并学会了利用一切有利手段，对有损于自家尊严的人群进行还击；当玉米看到父亲失势、家庭即将坍塌之时，她便以小小的身驱换取权势的资本；当她看到妹妹的不幸之后，她又以惊人的膂力，为妹妹设计命运。在这个弱小而又强悍的女孩心中，权力、自尊、人性等以极为罕见的方式纠缠在一起，抗争着各种吊诡的世俗伦理，从而使她不断地坠入命运的怪圈。

东西的《没有语言的生活》是一部在叙事上极具挑战性的中篇。王老炳一家三口都是残障人员：瞎子父亲王老炳，聋子儿子王家宽，哑巴儿媳蔡玉珍。这个无法交流的家庭，注定了叙事发展的艰难，也注定了他们生活的不幸。在内外交困的现实中，他们终于借助一种特有的智慧达到了生活的默契——让瞎子发问，哑巴点头或摇头，聋子再把看到的

说出来告诉瞎子，由此实现了必要的生存交流。特别是当心智健全的王胜利出生之后，一切都充满了希望。然而，当王胜利步入校园，却被同学们击毁了所有尊严，并慢慢变得沉默寡言，全家从此又过上“没有语言的生活”。他们战胜了不幸的命运，却无法战胜世俗的卑琐眼光。

王瑞芸的《姑父》通过一种旁观者的视角，再现了一位备受时代摧残的姑父形象。姑父年轻时是一个英俊潇洒、风度翩翩的精英人物，因为报馆老板逃到台湾前无意中给他留了一把枪，结果被判入狱二十年，从此沦为一个自私、懦弱、委琐的老头。在漫长的晚年生活中，他不仅要饱受梦魇的折磨，还要备受亲情的伤害。他像一个人鬼难分的幽灵，以罕见的悲剧命运，见证了时代的荒谬和人性的荒凉。

陈昌平的《英雄》是一部有关平庸人生的梦幻曲。退休工人老高一生平平淡无奇，却又幻想着生命的某种辉煌，于是在自我吹嘘中不断步入失控状态。一方面，他在幻像般的历史记忆中，体验着“英雄角色”所带来的人生快意，寻求一生中最后的辉煌和荣耀；但另一方面，历史背后的权力又不断地向他发出邀请，使他一步步不自觉地踏进了真正的幽暗地带。最后，当他被带到一位老干部的家中，一次看起来非常轻松、非常随意的谈话，便结束了老高的“英雄”梦想。

陈谦的《特蕾莎的流氓犯》是一部有关历史反思的精致之作。它从异域的文化背景出发，带着人们对自身“原罪”的追问与忏悔，引出了特殊年代里人们在青春、情爱与性欲的压抑之中所做出的暴力冲动。由这种冲动所构成的内心伤痛，使他们一生都无法逃离，更无法诀别，以至于在多年之后的异域他乡，特蕾莎与王旭东都还在为此纠缠。别有意味的是，当特蕾莎认定王旭东就是当年侵犯自己的“流氓犯”时，王旭东的叙述却表明他是另一个女孩的“流氓犯”，这说明了此类情形在那个年代并非个案。围绕着这样的“原罪”，特蕾莎和王旭东都进行了漫